

“官员财产公开”这个“笼子”该用上了

从“房妹”“房姐”事件给公众带来的强大心理刺激看,官员财产的公开已经到了必须切实推进的时候了,需要上上下下体制内外共同努力凝聚共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,哪怕是一个时间表,也能极大提升民众对未来的信心。

□本报评论员 金岭

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。”这个话充分表达了高层推进反腐败的政治意愿。把笼子织得严丝合缝,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,眼下最能坚定反腐败信心的举措,莫过于切实推进官员财产的公开。

这不仅因为官员财产公开是许多国家验证过的成功经验,更因为在这个特殊的阶段,由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磨合好,为权力和资本的结盟留下了巨大的闪转腾挪空间,官员财产公开,无疑是遏制这种倾向的重要关口。从“房妹”“房

姐”事件给公众带来的强大心理刺激看,官员财产的公开已经到了必须切实推进的时候了,需要上上下下体制内外共同努力凝聚共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,哪怕是一个时间表,也能极大提升民众对未来的信心。

官员财产公开已基本形成共识,民众期待已久。早在1995年,中纪委就将“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”写入有关文件,但达成“公开”的目标,却一直步履维艰进展缓慢,其间随着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,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不断上升,以及灰色收入的存在,舆论对官员财产

公开的呼声更为强烈,虽然有少数官员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此有异议,但总体看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,已积蓄起足够推动制度创新的社会能量。

官员财产公开,能切实增强增进官民互信,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度,甚至可能推进整个社会的道德改良。在一些官员腐败案件的刺激下,当今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对官员腐败的强大想象力,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官员贪腐是普遍的正常现象,不贪不腐反而是不正常的,进而把整个官员群体想象成生活在灰色地带的特殊利益群体,这极大地损害甚

至割裂了干群关系,培养着舆论场中的极端情绪,威胁着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官民之间的互信,官员财产公开,将是破除这种想象,建立官民互信的最有效的办法。

多年来,一提官员财产公开,总会有专家学者出面强调这困难那困难,比如基础条件不具备等等,有的甚至说还得等个十年二十年才有戏,但难度有没有一些人的想象和描述得那样大,很值得怀疑。广州的一位官员说,该市的市管干部才两千多人,至少这个层级的公开难度没有那么大。在信息流动极快,社会智力资源迅猛

增长的今天,民众对重大决策和公共事务认知和判断的总体能力,和专家智囊已基本处于对称状态,再一厢情愿地强调公开的难度,已经很难取信于民,更难和已有的社会共识对接。

官员财产公开既要鼓励地方的探索,也应鼓励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个人先行一步。最近,不断有官员表示赞成官员财产公开,并表示一旦制度确立,会带头公开。事实上,官员个人以公民的身份公开财产,并没有法律和道德障碍,更不太可能有谁去禁止,如果有拘束,那也只能是潜规则的制约。既然人民有监督政

府官员的宪法权利,那么官员就有接受监督的义务,自觉公开,正是主动履行义务的表现,在法理和道德上都没有什么障碍。如果能鼓励官员个人先行一步,那将为全面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面对可能到来的财产公开,一些干干净净不谋私利的官员可能会感到委屈,但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的理念,就是要把人们对权力和人性关系的认识拉回到常识的层面,充分认识到严厉的制度约束才是对官员最好的保护。这种意识若得以确立,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。

多户口“画皮”非扒不可

从“房妹”到“房姐”,这种利用户籍管理的漏洞,虚构多重身份图谋不当利益的做法,正在为腐败行为提供瞒天过海的“画皮”,必须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警惕。

□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

因为被爆出拥有超过10亿元的房产,陕西省神木县农商行原副行长龚爱爱名噪一时。经媒体查实,除了10亿房产,龚爱爱居然至少拥有四个户口,身份多重多样,堪称“狡兔三窟”这句老话的现实版本。

联想起郑州“房妹”全家都是双户口,借此坐拥29套房产的事实,显然类似的手法已经绝非个例。这种利用

户籍管理的漏洞,虚构多重身份图谋不当利益的做法,正在为腐败行为提供瞒天过海的“画皮”,必须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警惕。

依据现行户籍法规,一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户籍,身份证号也是唯一的,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。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行为准则,比如婚姻、购房、社保、开设银行账户、申请护照,甚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,都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下的。一旦这个

前提被蓄意破坏,那么法律与伦理都将陷于尴尬的境地,滋生出难以预料的恶果。

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官员拥有多个户籍,在法律意义上便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,相当于拥有了变幻莫测的“分身术”,可以在多种身份的掩护之下,为所欲为地捞足好处,并逃避法规的约束与制裁。试想一下,如果不是知情人举报,以四个户口中的任一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龚爱爱,或许都是遵

纪守法的好公民。而备受公众期待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,在这些分身有道的“房姐”、“房妹”面前将完全被架空,很难起到有效的反腐作用。更可怕的是,一旦这种方法被更多的不法之徒所借鉴效仿,那么势必会给反腐工作带来更大的阻力。

要想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发生,首要的是加大身份造假者的违法成本。对于腐败案件中涉嫌参与身份造假的人员,应当一查到底,绝不

姑息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,反腐要“老虎苍蝇一起打”,如果身家亿万的主谋是“老虎”,那么参与身份造假的从犯便是“苍蝇”。所以,对于“房姐”、“房妹”们多重户口的来历,司法机关必须查个水落石出,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。

同时,管理部门也可以在技术上探索一些新的办法,让身份认证方法更为严密。比如现有的二代身份证,已经具有了指纹记录功能,

部分地区也已经开始推行二代证登记指纹的办法。如果能尽快地将官员以及国企管理人员的指纹资料备案,或许能够对身份造假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。

从“房姐”、“房妹”可以看出,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确实存在着种种问题,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。因此,既要堵住户籍管理制度的漏洞,更要坚决打击种种在户籍造假遮蔽下的腐败行为,已成当务之急。

管不好钱袋子,公款吃喝自会转移

公民论坛

□赵勇

年底将近,正是公务宴请的高峰期。最近中央厉行节约,三令五申要求遏制公款大吃大喝之风。号召之下,公务吃喝之风得到遏制,一些地方酒店上座率明显下滑。但诡异的是,部分单位竟然将公款吃喝转移到了内部餐厅,而这些内部餐厅装修之精,标准之高堪比五星级饭店。还有一些公务宴请化整为零,“隐身埋名”,宴请单

位成了一些酒楼最大的机密。(1月23日《新京报》)

公款吃喝向内部餐厅转移和化整为零“隐身埋名”,想必是一些单位奉行的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。如果这种“对策”不被遏制,厉行节约到了最后就会令公款吃喝更加隐蔽,更加难以监督,这显然与遏制公款吃喝的本意背道而驰。

怎么办?一家家去清查,哪些单位将公款吃喝转移到了内部餐厅,哪些单位搞隐蔽的公务宴请,这显然不现实。真正可行的办法,是通过完善制度管好机关单位的钱袋子,逼着他们把每一笔支出

都细细地晒在阳光下。钱袋子管好了,财政支出全透明了,公款吃喝就可不药而愈。

在这方面,河南焦作推行多年的“财政全透明”是一个很好的先例。而在焦作之前,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走得更远——财政支出不仅公布款项,而且全部有明细可查,细到买了几瓶矿泉水花了多少钱,都一一可见。

一时一地的治理公款吃喝,只能治标;整体上加快财政支出全透明的步伐,管好机关单位的钱袋子,让他们不能也不敢乱花钱,才能治本。



腐败说到底是对权力监督不到位

读者来信

编辑:

你好。

读了贵报1月23日时评版刊发的评论员文章《权力进“笼子”,权利才能扬眉吐气》,我深有感触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,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,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,这无疑抓住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,为我们反腐败指明了方向。

我们曾无数次听过落马贪官的忏悔,他们无一例外都后悔当初没有主动接受监督,权力无限膨胀而得不到制约从而走向犯罪。这说明

了失去制约与监督的权力会带来怎样的后果,也说明我们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多么的脆弱,它建立在官员自己不能接受的基础上。换句话说,手握大权的官员,如果不愿接受监督,所有的规定约束就是一纸空文,监督就会流于形式。

无数事实证明,现代政治学把预防和遏制人性中恶的方面作为其学科的逻辑起点,用法律、制度、规章来管制人的活动,是极具科学性的。从近年来出现的腐败现象来看,腐败已不能仅仅以个人的道德品质来解释。目前我们在防治腐败的过程中,仍然过多地强调自律,强调觉悟,强调“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”,“人是可以教

育好的”。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,树立正确的世界观,这当然需要。但是,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制定防治腐败的政策措施,往往流于形式,成为官样文章,甚至是作秀。事实上,官员的腐败归根结底不是单纯的思想意识问题,对权力的监督不严密、不到位,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。如果仅凭道德教化,靠个人的自身修养甚至社会文明的进步来防止人性中恶的发展,只能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。过分相信人的觉悟,相信官越大觉悟越高,越不需要监督,其实是唯心主义的观点。

读者:王金才

■本版投稿邮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

“为公务员建集资房”的提案还是省省吧

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于23日下午开幕。广东省民建,省台盟都提交提案,建议通过建集资房等方式,解决省直公务员住房问题。省台盟表示,该省公务员工资水平远远落后于房价,现在的公务员在学校里大多品学兼优,但薪酬远低于企业同等资历人员。建议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实行旧区旧房改造,允许各单位以集资等形式,改造改建。(1月23日《南方日报》)

按照广东省台盟的意思,广东省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远远落后于房价,所领取

的千元住房补贴连市区租房都很困难。试问,全国有几个城市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能够超过当地的房价?在很多城市,普通上班族月收入才一两千,当地房价早已突破万元,为什么没人呼吁给他们也建集资房?

公务员的住房问题当然要解决,但解决的途径,肯定不是依靠享受各种“政策福利”建设集资房。尤其是在公务员群体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收入最有保障,福利最为优渥的社会阶层之时,还在想着怎么让他们“隐性收入”更高,福利保障更优厚,是否

考虑过社会公平问题?是否考虑过普通民众的心理感受?这种时候,还有政协委员只想着给他们锦上添花,却不想着为更多社会底层群众雪中送炭,这样的政协提案,除了给公众提供了炮轰的炮弹之外,看不出它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。

苑广阔/文 李宏宇/画

